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于铁军

内容提要:同盟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同盟理论以势力均衡论为基础,其许多内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论、“威胁均衡理论”以及对导致体系不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等。与传统理论相比,这些理论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实证性。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9789(1999)05 - 0014 - 25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

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 H. 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 J. Christensen & Jack 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r-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

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4, No. 3, July 1984, pp. 461 - 495.

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

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 - 168. "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Michael E. Brown et al.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pp. 73 - 74.

奥利·霍尔斯特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 Ole R. Holsti et al.,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3), pp. 249 - 283.

See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 268 - 269.

(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 1971 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

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同盟与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Spring 1990), p. 104.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12.

Robert Osgood,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 18.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p. 105.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5—250 页;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p. 184—212.

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特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

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

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

See Wolfers, "Alliances," p. 270; and Osgood, *op. cit.* p. 18, 25.

See Osgood, *ibid.*, pp. 21 - 22.

Wolfers, "Alliances," p. 269.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pp. 182 - 183.

Ibid., pp. 183 - 189.

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 70 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

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 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两个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p. 270.

See Liska, op. cit., pp. 61 - 69, 202 - 254, pp. 269 - 284;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pp. 217 - 229; and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Liska, p. 12;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 185.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7.

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概念。“抛弃”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 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

国际政治研究。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

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 6.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 466 - 467 and p. 494.

Ibid., pp. 483 - 489 and pp. 494 - 495. 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参见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9), p. 126. 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看风使舵”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Walt, *Origins of Alliances*, p. 275.

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 4 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 5 个假设:(1) 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 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 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 1955 年至 1979 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它不仅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

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

Ibid., pp. 21 - 28, and p. 32. 事实上,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参见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p. 183; Rothstein, op. cit., p. 53, pp. 58 - 59; and Holsti et al., op. cit., p. 88, 但将之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

Ibid., chapter 2, pp. 17 - 49.

Ibid., pp. 263 - 269.

Ibid., p. 263.

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 36 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2 (Spring 1988), pp. 275 - 316; Walt, “Alliances, Threats, and U. S. Grand Strategy: A Reply to Kaufman and Labs,”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448 - 482.

Glenn H. Snyder, “Alliances, Balances, and Stability,” p. 128.

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Michael E. Brown et al. (eds.), op. cit., p. 251, fn. 9 and fn. 10.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p. 174 - 175.

评中,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国家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quo bias),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

3. “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gang-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

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安全困境”理论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pp. 251 - 252, p. 256 and p. 270. 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

Ibid., p. 262. 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另外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 90 - 121.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7 and pp. 165 - 169.

Christensen and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p. 140 - 141.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pp. 167 - 214.

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 1914 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 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 1914—1918 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3 种范式并存的情况相对应,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

Christensen and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p. 144 - 147.

Ibid., pp. 147 - 167.

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3 种范式的比较,参见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 29 - 46.

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他们认为,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

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托马斯·锐生卡朋(Thomas Risse-Kappen)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在他的文章中,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p. 174; and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3, (Summer 1996), pp. 445 - 475.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73.

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01.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86 - 187; and Barnett, *ibid.*, pp. 403 - 404.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Katzenstein (ed.), *op. cit.*, p. 28.

Thomas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op. cit.*, pp. 355 - 399.

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 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 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 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 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照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

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 40 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

Ibid. , p. 371 and p. 397.

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 - 95), p. 47; and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91 - 92.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Spring 1997), pp. 166 - 167.

Ibid. , pp. 169 - 170.

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

结 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在对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研究进行了一番粗略的考察之后,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强调同盟与势力均衡的关系,老一辈现实主义者以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思想为同盟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的许多关于同盟的论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直到今天仍显示出生命力。新现实主义者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进行了不少改造,与传统学者相比,他们更专注于同盟研究的某个方面,并通过引进一些新的概念和变量,发展出各种关于同盟的专门理论(partial theories)。这些理论系统性、实证性强,从不同的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同盟的认识。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者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理论需要不断地争论、折中和综合,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解释变化的世界。但新的理论综合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作基础,无论就同盟理论的构成情况和发展过程,还是就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来看,目前能够提供这一基础的只有现实主义的理论。

对同盟进行综合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褒之者称它为和平的保障、民主共同体的典范,贬之者指责它加剧了紧张局势,甚至应该对战争负责。为了避免对同盟产

生误解,再强调一下现实主义在同盟问题上的几点基本认识也许是必要的:(1)任何同盟都有利有弊;(2)同盟是国际斗争的一种征兆而非原因;(3)同盟只是一种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4)对同盟的评价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个国家面对战争时,结盟将是它的选择,而同盟在积聚力量、制止侵略方面确实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作者简介:于铁军(1968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97 楼

收稿日期:1999-08-17

责任编辑:刘 绯

Michael C. Desch,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 165.

Wolfers, "Alliances," p. 270.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 212; and Wolfers, *ibid.*